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简介

辛鸿义 撰 文

岳 峰、袁运河 摄 影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座落在临沂市的东部，左濒沂河，周环金雀、银雀二山，波光岚影，林木苍郁，一派庄严肃穆景象。

陵园始建于一九四九年。当时山东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为人民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烈士，表彰他们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丰功殊勋，决定在全省修建五处大型陵园。位于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五〇年，陵园的主要建筑即基本建成。此后，又陆续增建和修葺。现在全园共有堂、塔、墓、馆、亭、碑等十多处，占地二百九十余亩，规模相当宏大。

陵园座北朝南，大门为坊式建筑，前面并立四条朱漆明柱，横枋皆彩绘，斗拱疏密相间，顶覆黄色琉璃瓦，当中横额题“烈士陵园”四个金色大字，雄伟端庄。大门两侧，红墙灰瓦，澹朴古雅。门前左侧为广场，右侧为桐林，春花夏荫，多姿多彩。周围碧溪回环，有一拱

形单孔石桥和园外马路相通。

进大门顺甬道往北走，依次为烈士纪念塔和烈士纪念堂。这些建筑都在一条中轴线上。烈士纪念塔用石灰石、花岗石和钢筋水泥构成，塔高四十五米，雄伟挺拔。正面为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金色大字。每个字平均一米半，金光熠熠。塔座为一石质平台，高二米五，周围绕以石槛。每边都有石阶数十级，和园内甬路相通。台阶之间，筑有花坛，杂植扁柏、芍药、黄杨、牡丹等树木花卉。平台上的塔墩为亭式，五个角上各有两条石柱，石柱顶端，镶着战争年代工、农、青、妇、兵，战斗生产和放哨警戒等内容的浮雕。亭内塔壁的上部，各有一幅大型的浅浮雕，题材都是表现我军英勇战斗取得伟大胜利的故事。浮雕下部各侧面，分别刻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题词“功在国家，名留青史”，山东省人民政府的题为《临沂革命烈士塔纪念》的碑文，中共鲁中南区党委、鲁中南行署和鲁中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碑文。此外，还有刘少奇、朱德、刘伯承、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纪念塔的上部为攒尖亭式建筑，顶端有一大型景泰蓝质红五角星，和银灰色塔身相衬托，更显沉稳庄重。

纪念塔的后面，为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甬路。沿路藤萝满架，柳丝飘拂，两行冬青，几树黄杨，十分幽静。复前行，一水横陈，柔波抚岸，游鱼浅翔，溪上一桥卧波，两边石槛回护。桥侧一池，呈五角星形。过桥不远，即烈士纪念馆。纪念馆系宫殿式建筑，崇宏庄严，气势磅礴，下为石灰石基座，高二米。堂的上部，两层飞檐，上覆青色琉璃甬瓦。正面廊檐下，悬一巨匾，上题“革命烈士纪念馆”。堂的围围，环以回廊，正面并立十四根明柱。进入纪念馆，迎门为一石碑，上镌周恩来同志题词：“人民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碑阴为任弼时同志的题词：“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碑前两侧，安放着王麓水、赵铸、刘炎、张元寿等四位烈士的半身石质浮雕像。纪念馆内两侧陈放着巨大的联碑，上面镌刻着六万一千八百十三位革命烈士的英名录。

纪念馆的前面，几树高大的塔松，层层叠叠，宝塔似地矗立两旁，错落有致。塔松的外侧，各有一处造型别致的厅式建筑，这就是战史馆和烈士事迹陈列馆。战史馆用大量的图表、照片、雕塑、绘画和实物，反映出党和人民在鲁南地区的斗争史，再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光辉战例。其中有远在一九

三二年发生在黄海之滨、震动全国的“日照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中共日照县委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而亲自领导发动的。起义持续十三天，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大小战斗三十多次，使国民党当局惊慌异常。《大公报》曾两次发布暴动新闻。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领导机关，都迁驻沂蒙山区，而当时全省的最高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就在沂南县的青驼寺诞生，使这一地区成为抗日斗争的心脏。一九四三年，八路军鲁中军区十一团八连的九十三名指战员，在蒙阴的岱崮阻击日本侵略者一个师团的进攻，浴血奋战十五个昼夜，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谱写出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荣获“英雄岱崮连”的光荣称号。解放战争时期，临沂是华东军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驻地。陈毅、粟裕、谭震林、罗炳辉等同志都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有名的孟良崮战役就发生在这个地区。一九四七年四月，华东野战军在蒙阴的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王牌七十四师，毙伤和俘获该部官兵三万二千多名，师长张灵甫被当场击毙。这次战役，挫败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扭转华东战局、促成全国战略

反攻，起了重要作用。烈士馆内，通过图片、文字等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为革命献身的尹景伊、赵铸、陈若克、罗炳辉以及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二十三位烈士的生平和事迹。

纪念塔前广阔的草坪两边，苍松翠柏掩映着八座风格各异的陵墓。这里分别安厝着罗炳辉、王麓水、汉斯·希伯、张元寿、刘炎、常恩多、陈明、辛锐和栗裕等九位烈士的忠骨。在东侧希伯墓的前方，有罗炳辉将军的塑像亭，亭为八角形，下有石灰石基座，周围各有台阶十二级。亭身为木石结构，两层飞檐，斗拱疏朗大方，顶覆绿色琉璃瓦。亭上匾额“瞻容思功”四字，为前山东省长赵健民所题。亭内有罗炳辉将军石质圆雕戎装立像，高一米九，体态魁梧，气宇轩昂。再现了罗将军生前的丰彩。烈士陵园建成后，原定名为“临沂革命烈士陵园”现名“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现在，在烈士长眠的地方，松柏含翠，百花吐艳。每逢节日假期，各界人士纷纷来此瞻仰，凭吊英灵。

范县长尊师重教二三事

范雪轩 李泽钧

1988年11月15日是民族英雄范筑先壮烈殉国五十周年纪念日。范筑先一生的光辉业绩说明，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将领，而且是一位政绩卓著的清官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仅据当年我们所见所闻范将军重视发展文化教育的事迹录志一二，以供参阅。

1933年冬天，范筑先奉调来临沂当了县长，上任不久就到驻城各学校视察。他亲自到教师和学生中间，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帮助解决问题。他最先去的是山东省立临沂中学，因为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动荡：省里派来的捕共队抓了进步学生，校长为此易人。他多次来跟教师谈心，给学生讲话，安定师生情绪，鼓励他们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将来为救国救民效力。查访中他听说临沂双井口小学（今朝阳小学）办得好，有一天他便来到该校，察看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便跟校长张稼轼说：

“你们学校办得很好，我把小女树琬、树珊送来，请诸位老师管教好吗？”校长答应之后，第二天便把他的两个小女儿送到三年级，从此范雪轩老师就成了县长女儿范树琬、范树珊的班主任老师。他还特地嘱咐老师：“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啊，请诸位多多费心，对我的孩子严加管教，绝不要特殊看待，姑息迁就，拜托了！”教学中，老师们发现这两个新同学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生活俭朴，团结同学，从无优越表现。她们做值日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热心参加，对师长更是彬彬有礼。树琬的同位女生吴秀士（曾任西安矿业学院党委书记，已离休），家庭是城市贫民，她们相处十分友好，常常互相到对方家中去玩，县长夫人有时还热情地留秀士在家吃饭。

记得那时候范县长经常到双井口小学来，差不多每月都要来一、二次。他对老师的工资待遇生活条件，办学经费以及教学设备等都极为关心。他对本校一些进步教师教唱抗日歌曲，在壁报上搞抗日宣传给予赞扬。由于范县长平易近人，时间一久便和老师们交上了朋友，大家见了他也就无话不说了。有一次，一个教师说：“过去的县官很少到学校来，范县长为何如此重视教育？”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以为‘教育乃万事之基’。古圣先贤最讲教化，孔夫子培养了四大贤人、七十二弟子，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发展和强盛起了很大作用，这是老师的功劳！近百年来，中国处处受人欺侮，贫穷落后，更应该着力发展教育，对全体国民来一个启蒙。广大民众文化提高了，中国就有希望了。”

“教育乃万事之基”的思想，是范筑先一生的经验总结。据有关资料记载，1881年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幼时只读过四年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又勤备好学，故而成绩出众，深得老师器重。但是由于父亲过早去世，只好中途辍学，才十三岁就回家务农，并帮助母亲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为了谋生，他从十八岁起就在运河线上推板车，给地主运粮或帮船主拉纤，靠一点微薄收入度日。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洋人侵略，劳苦大众受尽列强欺凌和封建压迫。那时他常想，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落后造成的。所以他每天干完活，不管多么劳累，都要在晚上学习一阵，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象那些千古名人一样，拼杀疆场，救民水火。机会终于来了，1904年（光绪三十年），北洋军来鲁西招募新兵，二十三岁的范筑先便志愿到马厂投军，一开始当了个“备补

兵”，以后升为“副兵”。由于他有一定文化，又酷爱学习，因而受到赏识。先后被选拔进第四镇随营学校和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几年之间便由“正目”升为“哨官”。民国建立后，北洋军改为中央陆军。在军阀混战的那些年里，他从炮兵连长一直升到旅长。这期间，他靠自学不仅对军事学有了精深地了解，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有了较深刻地认识和研究。他经常为同胞自相残杀而痛苦。1924年他毅然交出兵权从沪浙联军中退下来，暂时隐居上海。他对冯玉祥将军一向怀有崇敬之意，1930年应同村好友张维玺（第十三军军长）的邀请又在西北军里挂了个高级参谋的名义，参赞戎机，后来干脆退出军队，回到馆陶县南彦寺老家闭门思过。他反复想，这些年的不义之战，弄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老百姓哪一天才得安生呢？最后他决定创办教育，从培养有头脑、懂科学的人才出发，达到平息内战、强国富民的目的。由此，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县的教育机关补助学校，想以兴办学校终其生，而求心之所安。可是过了不久，他又观察到，受他资助的那些学校，其办学思想及所培养的人材并不理想，便决心效法武训，在本村办起一所“范氏义学”，专

门招收贫苦儿童入学，不收学费和书钱。他要求学生在校不仅学习文化，还要了解社会，并为将来谋生学点劳动本领，他的这些做法深受群众欢迎。于是范老先生办学有方的美名被广为传颂。

范筑先来到临沂，这使他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好机会。下车伊始，他就仔细阅读了《沂州府志》和《临沂县志》，并且深入考察，很快就了解了临沂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他十分同情临沂人民所受的水旱兵匪灾害之苦，决心励精图治，在任期间尽力为人民做几件好事。他宵旰勤劳，夙兴夜寐，言行一致，一身示范，三年当中使政府机关铲除了贪官污吏，树立了廉洁奉公的好作风；他亲率团队剿灭土匪，安定了社会秩序；他努力整理税收财政，把苛捐杂税进行裁并，只保留几种正当税收，而且简化手续，便民利国。由于府库充实，他便在修路、建桥、扶贫救灾、振兴实业的同时，把经费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常说：“如果教育办得好，民众知识高，一切都有办法。”加之，他又善于利用行政权力来推动教育，所以收效就特别显著。

为了整顿社会秩序转变不良风气，他发动了戒烟(鸦片)、禁赌运动。他充分发挥民众教

育馆和广大教师的作用，运用讲演、说书、相声、活报剧、顺口溜和漫画、标语、传单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精神压力，再加上行政和法制的力量，吸毒贩毒和偷盗赌博的恶习被一时禁绝。当时被范县长推荐到民教馆工作的宣传员范持九、刘少千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不仅自编了许多节目带头在各种集市或庙会上宣传演出，而且通过举办“书词训练班”，把散处在下层社会的说古书的、唱小戏的，以及许多盲人收拢起来，教以新编鼓词、平词、音乐常识等，并给以生活补贴，让他们通过艺术的形式把文明和法律送到陋巷穷村，因而深受群众欢迎。范筑先从政的最大特点是公正廉明，教育为主，恩威并施，故而收效迅速、显著。他的名字很快传遍城乡。那时候在临沂真是好人扬眉吐气，坏人胆颤心惊。他经常身穿便服骑一辆自行车深入农村，有一次竟只身闯进一个土匪窝里。只见十几名匪徒正赤膊聚赌。他正气凛然，大喝一声：“不准赌博！认得我吗？我就是范筑先！”土匪一时吓呆了，又不知外面来了多少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个跪下磕头求饶。范县长对他们严肃申斥：“你们大都是穷人出身，为什么要苦害百姓？晚上

抢劫、白天嫖赌，又怕被官府抓住杀头，东躲西藏成了亡命之徒，何日是个头？”匪徒们哆哆嗦嗦地喊“大老爷开恩！”县长当场审问，没收脏物，多数教育释放，只把个别头目交村送往县衙处理。一朝除去匪患，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夸范县长是“范青天”。

范筑先的教育观与众不同，不论是古代的孔夫子、韩愈、朱熹、武训，还是近代的陶行知、梁漱溟，他都很敬重，认为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有可取之处；为了给我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教育发展道路，他们勇于实践的精神都是可贵的。他来自农村，深知农民办学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合格教师。在临沂期间，他经常到山东省立临沂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去，这不仅因为他与曹香谷校长早年同在冯玉祥部下共过事，都始终保持着西北军艰苦朴素的作风，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主张教育救国，都热切地关心着发展乡村教育和培养师资的工作。范筑先对临沂乡师重视爱国教育，劳动实习，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有益活动的做法十分欣赏。原来临沂乡师在埠前店开辟的乡村教育实验区，他不但从各方面大力支持，而且还亲自前去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这给广大的乡村教师以莫大鼓舞。在这个实验区里，中心村有完全小学，周围村都有初

级小学，但是失学儿童和文盲仍然很多。范筑先便支持乡师实习学生和在校师生采用小先生制，办起儿童识字班、妇女班、男子班、民众夜校，让大家都来学文化。他想，农民懂了爱国道理，又学得了科学知识，农村发展就有了希望。1935年在推进乡村建设的活动中，实验区还建立了乡村医院、特约农场、农业展览室以及推动开展造林、放足、卫生等的组织，使这一带的农村面貌有了明显变化。

范筑先一贯主张对青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患，人人忧心忡忡。他觉得只要把年轻一代教育培养好，中国就会有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当时临沂的各个中学、师范和小学里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任临沂县长的那几年，举办讲演会已经成了制度。每年春季各校普遍举行之后，再选拔优秀者参加在省立临沂中学大礼堂举行的“临沂县中小学讲演比赛大会”。范县长不仅每次到会参加评判而且总要即席讲话。1935年那次比赛，到会的讲演者、评判人、各校师生及各界代表达800余人。

对于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他也一向寄予同情。1936年初夏，临沂中学进步学生徐伯选、胡威廉、孔兆环、陈其昌四个人被叛徒马兰

村等(省捕共队员)抓去，关押在县府内一间小屋里。为了邀功请赏，他们竟不惜动用肉刑。范县长得知后立即制止并且训斥道：“你们都是青年人，为什么这样惨无人道？你们想想，昨天你们是什么样？今天又怎么样？（意即过去曾经是进步的，叛变后翻过来残害从前的伙伴）今后再敢胡作非为，我先给你们每人一百军棍！”这些家伙见势不妙就灰溜溜地跑了。范县长把这四个青年叫来亲自审问：“你们真是共产党吗？”前边三人都摇头说不是，最后一个却出乎意料，他豪爽地承认“我是！”县长听了先是哈哈大笑，随即板起面孔批驳他说：“不许胡说八道！你一个毛孩子懂得什么是共产？今后要老老实实学习，遵守学校纪律。都回学校去吧！”这些进步青年，后来大多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当年临沂县的教育事业，由于范县长的特殊重视和对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1935年底，全县已有完全小学38处（其中县立15处，区立19处，私立4处），初级小学303处（其中县立6处，区立294处，私立3处），较民国初期（北伐前）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增长两倍。范县长并不满足这些，他发现城里因生活所迫不能入学的孩子

仍然不少，可是教育经费毕竟有限，怎么办？他一方面约请驻军旅长李占标及地方士绅出钱，办起了一所“私立进德小学”，把一切能入学的儿童尽量动员上学；另一方面在民教馆已办民众学校29处的基础上，又支持范持九等人办起露天学校4处，把100多名拣煤渣、拾柴禾、卖油条的孩子分别收进早班、午班、下午班里，学习国语和算术。当年第一个报名入露天学校的穷孩子董印里如今已是天津市一家医院的党委书记了（已离休）。范筑先办教育，讲求对社会的实际作用，还表现在他对职业教育的兴趣上。1935年他为了给高小毕业生开辟一条就业之路，在小教场创办了一所“临沂县立职业学校”，学制二年，每年招收一个班30人，实行半工半读。学生半日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如机织法、染色学等；半日参加织布、织袜和编织等劳动。这些学生毕业后除部分留校外，大部利用所学专长谋得了职业，深得社会各方好评。

对于文化事业，范筑先在任临沂县长期间也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提及：一是发动地方上层人士自动捐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范筑先筹办地方公益事业惯用的办法），在城内北大寺兴建了“临沂县进德分会”，1936年七月一日正式成

立，范县长亲任执行委员。内有大礼堂、图书室、阅报室、乒乓球室、国术同乐组、同乐亭、剧场、网球场、篮球场、鼓书场以及饲养有山鸡、水雁和猴子的小厦等。每当下班之后，人们可到这里来参加各种有益活动，星期天男女老幼都来此游乐，热闹非凡。这对实现他铲除恶习、改良社会风气的宏愿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二是编纂《续修临沂县志》，这是北伐之后几任县长想办但都未办成的事。范筑先不负众望，毅然肩负起这项历史的责任。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他亲任总纂，下设县志局，聘请分纂9人，专职采访17人，事务员、书记员各1人，其他为兼职的名誉采访，有63人。他们分工负责、通力合作。从1935年3月开始，到同年8月完成，仅用6个月时间就编写出一部包括四册十七卷的全部志稿，年底付印，1936年初正式发行。

范筑先离开临沂，又在沂水当了半年县长，于1937年春到了聊城，就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这给他发挥政治才干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不久日本侵略军从蚕食华北进而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通过亲信张维翰（共产党员张维玺的弟弟）与我党建立了

合作抗日的关系。国难当头，他处处以大局为重，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开创了鲁西北合作抗战的大好局面。他按照“乡村建设”的做法，在辖区内大办乡农学校，推行壮丁训练，发展民众教育，让群众既“习文练武”又明白抗日救国的道理，从而培养起同仇敌忾之心创建了守土抗战的武装力量。当时民团蜂起，支派分歧，有的行同盗匪鱼肉乡民，有的争夺地盘、实行火併。范筑先都以教育者的态度深入虎穴，以政治家的感召力降服群雄，共同对敌。他把过去曾在临沂等地创导过的“农业推广”、“合作指导”、“防空防毒训练”、“救护伤员”、“民众知识教育”和“抗战宣传”活动，动员本区全体教师通过广泛宣传普遍开展起来。由于这种教育密切联系抗日和生产实际，所以收效特别显著。1937年十一月，当第六区各县县长奉韩复榘之命逃往黄河以南，他不仅接受我鲁西北特委劝告坚决留下抗日，而且派出许多年轻有为的同志（大部为共产党员）担任县长，同时专区和县的政训处也聘请了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工作人员。当时全区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医生、中小學生，纷纷响应范专员的号召，到政训处所办各类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们大都参加到抗日武装、